

台湾学术丛书

施善与教化

——明清的慈善组织

梁其姿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乾隆中后期的同善会成立已有先例可仿、有成规可循。

虽然这些善会的运作仍然由地方士民推动。

但是在创建过程中：

官方的“正式”批准已成为主要的步骤。

而印刷发布上述“同善会书”。

以推广同善会之成立也成为县令的责任之一。

乾隆期同善会的重现有特殊意义。

此时同善会的出现是正式承认源自明末的传统。

这是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

我们记得顺治时代禁止文人结社的法令一度中止了同善会的发展。

及禁压了这个与东林党人关系深刻的组织所可能令人产生的政治性联想。

这个禁忌在乾隆期随着同善会的重现而消失。

清政府不再害怕重提明末同善会这段新近的历史。

不再单以“大同篇”或宋代的官方慈善机构这些“安全”的历史。

作为诸善堂在意识形态上的依靠。

这个发展反映了清政权在乾隆初期已有非常充分的自信心。

并有能力将慈善组织有效地“非政治化”。

即透过颁发“同善会书”强调明末善会领导人劝人行善积德的论述。

完全淡化了他们原来对政府不满的态度。

及彻底将他们原来的反抗意识从集体记忆中清除。

换言之，乾隆期清政府眼中的善堂。

与顺治时的善会已不一样。

后者仍意味着地方社会与中央的对立。

前者则已成为清政权正当性的象征之一。

可以说，此时政府对社会的猜忌相对的减低。

对本身支配社会的自信相对地提高。

此时的同善会表面上肯定了明末的传统。

而实际上这两个相隔了一个世纪的同善会有基本上的差别。

这些差别基于两个时代的不同社会政治环境。

首先，豫州时代与乾隆时代的一大分别。

在于后者是中央政权强大的时代。

而前者则相反，因此盛清的同善会已少不了官方的鼓励与推动。

而明代同善会则是纯粹由地方主人所办。

没有任何官方的参与。

清代地方官对同善会成立的鼓励不限于发文推动各地设办。

而且有时甚至会拨房屋给这些同善会建会馆。

如高邮州的同善会就设在知县所筑的旧书院内；

有时知县会订定善会的规条。

例如枫泾同善会在一七五四年、平湖同善会在一七五〇及一七七四年的规条均由知县所修定。

姑勿论这些知县是否只是挂名颁布规条。

这个做法明显地是为了增加善会的权威性。

也是明末善会所没有的特色。

由于这些乾隆同善会与官方关系密切。

它们也得与官方分担一些备荒及救荒的工作。

官方期待这些同善会“协办”济荒的大小事宜。

如设社仓、设粥厂、劝赈、平糶等。

而枫泾镇善会的建会馆与嘉善县善会的复办。

同在乾隆二十年。

与当年发生的严重饥荒，需要官绅合力救荒有密切关系。

无疑地，官方已视这些同善会为半官方的组织。

也就是听命于政府。

但又没有衙役从中舞弊的民间组织。

台湾学术丛书

施善与教化
——明清的慈善组织

梁其姿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梁其姿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9

(台湾学术丛书/陈平原主编)

ISBN 7-5434-4305-8

I. 施… II. 梁… III. 慈善事业-组织机构-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D69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2204 号

书 名	台湾学术丛书 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作 者	梁其姿
责任编辑	杨惠龙
装帧设计	刘 昕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天润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45 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字 数	393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版 次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305-8/I·610
定 价	26.4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本不该为区区海峡所隔绝。可很长时间里，由于政治环境的制约，海峡两岸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分途发展，缺乏必要的理解与沟通。这种局面，目前已有很大改观。两岸学者的你来我往，已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对各自的学术思路及发展路向，双方也都有相当的了解。由此而引发相互间的借鉴、补充乃至竞争，对学术的正常发展，均有益无害。

可惜的是，虽然大陆的学术著作早已纷纷登陆宝岛，台湾学人的研究成果，至今仍不大为大陆学界所熟悉。关键在于，与各种“台湾文学丛书”此起彼伏形成鲜明对照，大陆出版界明显冷落台湾学人的创造性劳动。这就难怪，除了私人馈赠及大图书馆的少量收藏，大陆学界难得一见台湾同行的著述。

厚重的专业著述，固然不及轻灵的流行歌曲

BAD88/02

或散文、小说读者面广，可更能体现一时代一区域文化人的社会关怀、历史意识以及哲学思考。完全撇开台湾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很难理解今日台湾的文化、思想、学术乃至政治与经济。

打破长期的隔阂，让台湾学者所创造的思想文化资源也能大陆知识界所共享，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本丛书希望积以跬步，先从目前活跃在台湾学界的中生代入手，逐渐推广扩大，使之成为展现五十年来台湾学术建设的窗口，也为日后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方便。

本丛书的选目，暂以人文研究为限，希望兼及在台湾学界已经产生影响与在大陆学界可能发挥作用的著作。至于研究方法和学术路数，则不问新旧中西。

为方便大陆读者，各书附录作者的问学经历及著述年表，以便有心人按图索骥。

陈平原

1998年8月5日于边陲旅次

大陆版序

近年来大陆学者对研究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社会文化史的兴趣似乎越来越浓。不但在学术期刊上会看到相关的论文，而且我也偶尔会收到大陆同行的来信，与我讨论相关的问题。这些都让孤独作研究的人感到精神愉快。

《施善与教化》在台湾出版已快两年。它是我过去约十年来研究工作的一项小小的成果。由于我较早开始做这个研究，成果刚出来时引起了一些同行的注意，一刷在半年内售罄，台北经联出版公司在1998年初发行二刷。当时我已希望此书能有机会在大陆再版，让更多同行看到，给我更多的意见与批评。这个心愿终于得到实现。经由李孝悌先生的引介，及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帮忙，此书现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大陆再版，正式与大陆的读者见面。

我特别希望此书的大陆版会引起更多各地研

究者对慈善组织及其相关问题的兴趣。我过去十年的研究主要受限于在台湾及海外所能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方志资料。而我相信大陆各地所藏的地方史资料必然非常丰富，只是外人不易引用。如果当地学者能努力发掘及利用这些资料，一定能做出更有意思的研究。同时，我亦相信慈善组织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越晚近者越如是。探讨地方色彩不但是件有趣的研究工作，而且有学术上的重要性。传统的中国史研究太注重历史现象的普遍性，而忽略了地方的历史特色，也因而削减了历史应有的丰富性与生命力。我在法国留学时即惊讶于一个小小的法国竟有如此丰富、有趣、充满人性的地方史研究成果，而庞大的中国的地方史研究却如此贫乏。《施善与教化》一书的不足之处就是无法深入探讨慈善组织的地方特色，这主要是受限于所能掌握的资料。在地方史料利用方面的突破，我相信要靠年轻一辈的大陆研究者的努力。

《施善与教化》一书出版前后，我的研究重点也已转移别处，但是对这个曾经长年占有我全部工作时间与精力的课题，至今仍然有一分依恋。此书在大陆再版，对作者来说是额外的安慰，希望对读者而言也同样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洪静君、陈妍两位小姐仔细校对简体字版。

梁其姿

1999年元旦于台北县汐止镇

自序

我自从1984年发表了有关育婴堂一文后,约十年来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明清的慈善组织上面。十多年前这是个没有人注意的题目,没有太多现成的论文可供参考,因此我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原始资料的收集及整理,希望至少可从中将这些组织理出一个大概历史轮廓出来。近年来注意这个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无论国内研究台湾史的年轻学者,或国际上较资深的研究各时代的学者,目前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慈善组织。在这个时候将我过去的研究工作做一个总结,应该是个好的时机。虽然本书内容与我过去曾发表的一些论文有重复的地方,但是,这本书不是论文集,而是以新的分析架构配合近年新的研究与资料重新写成的书,书稿在1995年初完成,交付出版。也算是在研究院工作多年的一个阶段性的交代。

1982年我在当时陈昭南所长的鼓励下进入

“中研院”这个极为优良的研究环境工作。对陈先生当年不但排斥我这个与台湾学术界毫无渊源的人，还给予我支持与充分的研究空间，让我自由地探索学术之路，至今仍然感激。

本书初稿完成后，几位老朋友费心看完了我的稿件，给我提供了宝贵的批评及意见，他们是沈松桥、陈永发、陈国栋、李孝悌、范毅军及刘铮云诸位先生；另一位一直关注我的研究的是刘翠溶女士。在这里特别感谢他们多年来的督促与鼓励。初稿也曾经两位不具名评审人仔细评审，感谢他们的意见与指正。当然，虽然经过修改，书中仍不免有许多不妥当之处，这些纯粹是我个人的过失。

此外，不少友人曾在个别的问题上给我提供资料或意见，在此无法一一致谢，只能在书里适当的地方向他们致意。

美国一些友人多年来关心我这个研究，他们的关心也是促使我写成此书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特别要感谢 Benjamin Elman、Charlotte Furth、Richard von Glahn、Susan Naquin、Evelyn Rawski、William Rowe 及黄宗智与高彦颐诸位先生。日本的沟口雄三与夫马进先生、北京的陈祖武先生也在我研究期间给予了协助与鼓励，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刘莲枝、陈秀娟、张蕙菁、林秀美几位小姐曾在资料收集及整理方面先后给我极大的帮忙。在这里除了感谢她们之外，还要祝福她们前途美好。

这个研究曾得“行政院国科会”及傅尔布莱特(Fulbright)基金的研究赞助。同时，除了在“中研院”各图书馆及汉学研究中心资料室收集资料外，1985~1986年间我到哈佛大学哈燕社、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一年，1993年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研究三个月，上述机构及图书馆都曾

给我提供研究资料方面的帮助，谨此致谢。

本书在联经出版公司顺利出版，得感谢林载爵先生的热心帮忙。

最后，谨以本书纪念先母、我敬爱的老师，广西岑溪陈静（观）女士（1922～1992）。

梁其姿

1997年元月于南港



清末北方的一个“惜字施棺”所



清末北方栖流所外流民群集

目 录

导 言	(1)
一、研究的角度	(3)
二、要探讨的问题	(4)
三、其他值得注意的相关历史现象	(7)
四、中国与江南社会	(7)
五、所用资料	(8)
第一章 明末以前的慈善——观念与制度变化.....	(12)
一、古代的贫穷观念	(13)
二、身份等级与经济地位的关系	(18)
三、小结：社会文化身份与经济地位关系的暧昧性	(25)
四、慈善组织的历史	(26)

第二章	明末清初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	(49)
一、明末善会的兴起		(50)
二、善会兴起的原因		(54)
三、明末清初“善人”的背景及活动		(82)
第三章	慈善组织的制度化(1655~1724)	(93)
一、明清慈善组织的过渡		
——扬州育婴社的例子		(94)
二、清初慈善机构的发展及制度化		(99)
三、清初期善堂的理想		(112)
四、“妇女慈仁”之政:中央政府对慈善组织的态度		
.....		(128)
第四章	慈善机构的“官僚化”(1724~1796)	(135)
一、官方的积极介入		(137)
二、新的同善会		
——与明末截然相异的意识形态		(152)
三、官僚与地方慈善家的关系		(160)
四、小结		(168)
第五章	乾隆中期以来慈善机构的“儒生化”	
——惜字会与清节堂的例子		(171)
一、惜字会		(172)
二、清节堂		(203)
三、本章小结		(238)

第六章 嘉庆以来慈善组织与小社区的发展…… (240)

一、配合家庭制度的保婴会 …………… (242)

二、施棺及综合性善堂的发展 …………… (278)

结论 …………… (307)

一、慈善组织是“福利国家”的前身吗? …………… (308)

二、慈善组织的领导层与意识形态的变化:

“儒生化”的发展 …………… (314)

三、公共范围与公民社会的争论 …………… (318)

附 录:

“明清慈善活动(公元1600~1850)”报告 …… (327)

附表一 育婴堂…………… (332)

附表二 清节类善堂…………… (368)

附表三 施棺类善堂…………… (377)

附表四 综合性善堂…………… (399)

附表五 方志…………… (412)

参考书目 …………… (508)

作者简历 …………… (543)

著作目录 …………… (544)

导 言

本书主要讨论明清时代的慈善组织，但并非所有的慈善事业。笔者感兴趣的是一方善士所共同组织的善会及善堂。这些组织不属宗教团体、也不属某一家族，是地方绅衿商人等集资、管理的长期慈善机构。这类组织通常并无重要的经济功能，各项活动亦无时间上的急迫性，如救弃婴，收养贫病、寡妇，施棺施药施米，甚至惜字纸等。这些机构并不包括以赈灾为主的社仓、义仓、粥厂等，此类组织直接地牵涉着经济，甚至政治秩序问题，有较长久的历史渊源，也有较多的政府参与。本书亦不讨论个别善士修桥补路式的善行，也不包括义田义庄类的家族救济组织，政府及宗教团体的赈济活动也自然不在讨论范围之内。宗教组织及家族所办的慈善活动的由来已久，并非独见于明清时期。而本书所讨论的慈善组织则是明清社会的新现象。

在时间方面，这个新现象出现在 16 世纪末期的明代。其后除了在 17 世纪中叶明清交接之际稍息数年外，一直有所发展。甚至在民国初期，为数不少的传统善堂仍在继续运作。但本书

所处理的善堂历史主要是 19 世纪中期以前的历史。我把研究集中在 1850 年以前，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考虑：16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的这段历史较有一致性。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的慈善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产物。19 世纪中期以后，我们看到较前所未有的社会变数：其一，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西方基督教组织在 19 世纪中以后大举进入中国，一方面与中国传统善堂竞争，一方面也因而影响了中国原有善堂的发展方向，此后的善堂已多少被“洋化”了^①；其二，经过十多年的太平天国运动，战乱造成中国社会——尤其在南方——在 19 世纪的下半叶处于百废待举的状态中，都市善堂因而担任了复杂的善后工作。即是说，它们的任务除了传统的救济工作外，同时也往往包括了维持政治秩序，这使得它们的性质有了较深远的变化，不再如咸丰以前的善堂那样单纯。可以说，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善堂有太多非传统的因素，分析起来令重点分散，倍加讨论上的困难，所以本书不处理这段历史，只在有特别需要时引用一二例来说明个别问题。

那究竟这个维持了几百年的现象有多普遍呢？笔者利用了两千多种的方志对整个清代的慈善组织作了一个统计：育婴组织先后共成立了至少 973 个，普济堂 399 个，清节堂类 216 个，以施棺为主的善会善堂 589 个，综合性的善会善堂 338 个，其他难以分类的 743 个，而且这些数字必然是低估的，因为实际

① 最早成立的西方教会慈善机构之一是上海青浦县的育婴堂，据徐家汇所藏《江南育婴堂记》所述：“江南教会自道光末教禁初开，即多建育婴公所，而以青浦县之蔡家湾为最大。”（卷二）有关 19 世纪中以后中国本土善堂与洋办善堂的竞争，可参看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帖选》，1984，页 289、315、396、397。

上无法参考所有的方志，而方志资料本身也常有遗漏。这些数字向我们显示慈善组织普遍性的大致程度。这些慈善组织遍布全国，省份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等于全国主要省份都有（详细统计资料见附录）。可以说慈善组织在清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们的重要性及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本书除了追溯明清慈善组织的渊源，并描述它们的组织形态、主要活动外，另一目的是探索这个新的历史现象与明清的社会经济，及思想发展的关系。我认为明清慈善组织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新现象，其中渗透了复杂而具体的文化因素；我们必须较全面地去了解这个现象，不但从客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去探讨善堂的成因，也更要从施善者的主观角度去分析善堂的功能与性质。基本上笔者尝试从社会文化史这个角度去讨论问题，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深入地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文化。

一、研究的角度

所谓文化史，并没有清楚的定义^①。我们只能说，它比传统的思想史更注意老百姓的价值观，更注意社会经济变化与价值观变化间的密切关系；与传统社会经济史不同的地方，则是不再认为纯粹的物质条件变化能充分地解释历史现象，人的价值观往往不受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催生新的、不全然配合现实的现象。我认为明清慈善组织正好说明了这点。从善会善堂

^① 有关最近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可参看 Hunt 1990。